

张骞功业的历史书写与形象接受研究

王华宝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汉代张骞的人物形象既有早期正史文本的历史书写,如《史记》“持汉节不失”的“博望侯”,《汉书》“博望杖节,收功大夏”,主体为使臣形象;也有历代文学作品对其形象的塑造,其中不乏归功思维的附会之说;还有历史书写与文学传说、宗教传播、文化归因的交融再生等,形成物种引进者、仙家神人等众多糅合再造的形象。人们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注入张骞形象之中,用不同的形式书写着自己心中的历史,生成了不同的新文本、新形象,有着极高的认知价值。对张骞功业的认知和形象接受,最核心的内容是“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张骞作为一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文明互鉴的开拓者之一,必然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故事。

关键词:张骞;历史贡献;历史书写;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7;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4)01-0005-06

OSID:



张骞(约前164—前114年)“凿空”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作为沟通中外文明的文化符号,举世公认。而张骞形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既有早期正史文本的历史书写,也有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塑造,还有历史书写与文学传说、宗教传播、文化归因的交融再生等。张骞受到历代关注,形象不断演化,自有其强盛的生命力,有着极高的认知价值。本文简要分析张骞功业在早期历史文本《史记》《汉书》中的书写以及历代张骞形象的接受与特点,以期对张骞研究与评价有所助益。

一、张骞功业的历史书写

关于张骞的史料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大宛列传》等篇章中,东汉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等文也有记载与充实,历代涉及的文献记载、评论众多。这里简要梳理《史记》《汉书》中的历史书写,以便辨源析流,梳脉理络。

(一)“持汉节不失”的“博望侯”:《史记》对张骞的历史书写

司马迁将名将卫青、霍去病合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附有公孙贺等16位征胡将领的简略事迹,张骞列于第9位,其文57个字:“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1]3561} 简要介绍了张骞的一生:一是出使西域联系月氏等夹击匈奴,返回后封为校尉;二是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因功封为博望侯;三是作为将军出征匈奴,误期后赎罪成为庶民;四是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系乌孙等夹击匈奴,返回后封为接待宾客之事的大行令,死后葬在家乡。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前文一处提及张骞跟随卫青之事,在元朔六年(前123年):“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1]3546} 另一处提到张骞跟随霍去病之事,在元

收稿日期:2023-08-10;**修回日期:**2023-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ZS013)

作者简介:王华宝(1965—),男,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训诂学。

引用格式:王华宝.张骞功业的历史书写与形象接受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4(1):5-10.

WANG Huabao.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Image Reception of Zhang Qian's Achievements [J]. 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4(1): 5-10.

狩二年(前121年):“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博望侯将万骑在后至。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郎中令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1]3547} 两处记载较57字之文丰富,可见太史公“互文”笔法之妙。《史记·匈奴列传》未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及跟随卫青出征立功之事,仅有张骞跟随霍去病出征受惩之事,可以相互印证。由此可见,跟随两位大将军出征,张骞一次因熟悉地理环境立功,加之前出使之功而封侯;另一次因带兵延误战机而赎罪成为庶民。作为军事将领的张骞,似未立下军功。

而体现张骞“使者”之功的最重要文献,当数《史记·大宛列传》。虽以“大宛”名篇,而记载张骞的经历与言论最为丰富,是研究张骞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开篇以“大宛之迹,见自张骞”,表明“大宛这地方是由张骞发现的”。开篇8字后接“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1]3833}。我们可以通过“汉中”“建元”“郎”等提取不少有用的历史信息。如“郎”字的信息量很大,“郎”在汉代是一种官名,郎官可以理解为宫廷侍卫。在皇帝身边做事,增加阅历,经过历练,再被任命担任具体的职位。并且汉代郎官,一般是从贵族子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加之其家有钱赎罪等,张骞更可能出身于贵族,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才俊。比认为张骞只是普通农民,由马夫当上郎官,似乎更为可信。

《史记·大宛列传》以张骞两次出使的经历和言谈展开,其后记贰师将军李广利之事,叙事与议论交错。清代吴见思的《史记论文》认为该篇是“结构奇绝”^{[2]74}的一篇好文章。《史记·大宛列传》对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路之艰难历程有详细的描述。为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遭匈奴扣压和软禁了十余年,娶妻生子,岁月消磨人,“然骞持汉节不失”,终于找到机会逃出来,他不是保全性命往回走,而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踏上寻找月氏的征程,过沙漠,翻葱岭,千辛万苦,找到月氏。由于月氏改变主意,张骞只能返回,而途中又被匈奴抓住,过了一年多,趁匈奴新老单于交替、内乱之际逃回长安。结果是“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可见其九死一生。

返回以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所到达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地情况,应当涉及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波斯)、印度(汉代称身毒或贤豆,唐代称天竺)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方面,为朝廷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基于张骞的

汇报和记述,汉朝扩大了对外界的了解,这是汉朝的地理大发现。张骞之行也将汉朝的影响力带到了他所到达的区域。这一区域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开通西域,则“丝绸之路”成为四处蔓延的网络,成为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各民族各地区各种文明联系在一起。

此后,张骞提出与乌孙结盟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设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资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1]3846}。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此次带了丝绸等大量财物,300人的使团,到达乌孙。尽管未能成功游说乌孙王东返,但重要的是,乌孙派使者数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并且张骞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为汉朝与乌孙等的联合与和平共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去世。

《史记·大宛列传》:“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1]3748} 以“凿空(开凿道路)”二字评价其功,以后的使者用“博望侯”的名号做信誉的保证,以此彰显张骞外交品行之高,可见张骞对后世影响极大。“博望侯”也由张骞的专名转变为“汉使”的通名,由此滋生某种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将众多事迹归功于张骞,成为一种可能。

明朝王鏊在《震泽长语》卷下“文章”类中说:“《史记》不与张骞立传,其始附《卫青》,而于《大宛传》备载始末。盖大宛诸国土俗,皆骞所归为武帝言者也。骞没后,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备具而有条例。若《汉书》,则大宛、张骞各自为传矣。”^{[3]43} 指出了《汉书》为张骞立传的正当性。

(二)“博望杖节,收功大夏”:《汉书》对张骞的历史书写

《汉书》列《张骞李广利传》,另外《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等也涉及张骞。“张骞传”的主要材料来自《史记》,《汉书》增加了“骞孙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使匈奴,给事中,为石显所潜,自杀”^{[4]2698}的内容。记载张骞之孙张猛仍然沿着祖父的足迹,出使匈奴,也为沟通民族关系做出贡献。《汉书·西域传》有“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强调其“始开西域”之功^{[4]3873}。

从史源看,张骞原始形象主要来源于《史记》,为汉武帝的军事目的出使西域,有使节、将军、大行令等身份。司马迁书写张骞的历史文本,既是对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录,也是对重大的典型历史事件的意

义阐发。由于司马迁对汉武帝与匈奴作战持批判倾向,涉及张骞出使西域的作用也就“事功”的评价着墨不多,对其开通西域的意义更难以体认,仅有对其个人因出使之功“尊贵”而引起吏卒效法“求使”的现象有所说明,但对张骞作为使者所保持的气节也就是“道德”的评论,则有一定的褒扬,“持节不失”“为人强力,宽大信人”。

汉代扬雄沿此倾向,多加传扬,如《法言·渊骞》:“张骞、苏武之奉使也,执节没身,不屈王命,虽古之肤使,其犹劣诸?”^{[5]482} 彰显了张骞“执节没身,不屈王命”的情操。

《汉书》转换视角,在《张骞李广利传》中记载:“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强调“事功”,更为重视功名“尊贵”。又强化坚毅果敢、忠君爱国、智慧远见的形象,张骞形象开始有所转变并更加丰富,对其历史功绩多加肯定,如在《汉书·郑吉传》中“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4]3006};在《汉书·叙传下》中以“博望杖节,收功大夏”8字总结张骞一生^{[6]4256};又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论曰”称张骞“怀致远之略。”^{[6]2931} 张骞在汉代成为一种人生楷模。

二、历代张骞形象的接受与特点

自西汉司马迁客观书写张骞事迹以来,其形象便定格为一种文本,经东汉班固的描述,汉代中后期,张骞基本以持节“使臣”形象、将军形象、功名形象^{[6]1571}、开拓者形象^[7]定型。其后,被人们以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审视,被不断地接受与阐释、解构与重构。人们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注入张骞形象之中,用不同的形式书写着自己心中的历史,也书写着个体对人生的体悟,生成了不同的新文本、新形象。历代对张骞的评价,主要以“事功”与“道德”两方面为标准进行衡量,展现出张骞形象的时代性、多元性、丰富性,背后隐藏的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的文化心理。这里简要讨论几种形象的成因、特点等。

(一)物种引进者形象

从东汉后期开始,人们认为张骞带回各种域外物产资源。因《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汉使从西域带来葡萄、苜蓿等物种,天马等动物,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王逸等^①,认为张骞带回葡萄、苜蓿、大蒜等。此外,延笃也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大蒜。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张骞引进更多的植物种子,除葡萄、苜蓿、大蒜外,还有胡荽、安石榴、胡麻、胡桃

等^②。东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各种物产。另一文学家陆机在写给弟弟陆云的信中,也提及张骞“得苜蓿归”“得涂林,安石榴也”^{[8]179}。这些物产是否真是由张骞从西域带回?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葡萄、苜蓿等,是李广利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伐大宛后,由汉使者带回。人们误读文本,归功于张骞^[9]。

总的来说,张骞物种引进者形象是不符合史实的形象建构。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张骞居功至伟,人们将这一时期中外的一切交往成果归功于他,也是文化归因的一种体现,又有着某种合理的内核。

(二)仙家神人形象

自东汉末佛学家牟子(公元170—?年)记载张骞与佛教有关以后,佛、道两教的大量著作,一致认同张骞与佛教传入中国有关。甚至让张骞出现在200年后汉明帝派遣的求法使者中。张骞形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呈现出与史志较大的变化,求仙问佛,呈现出仙家神人形象。具体又有西域求经、寻仙与乘槎经月之别。

汉武帝时代佛教传入中国之说,开始于三国时张晏误读《史记·匈奴列传》之“金人”,认为金人即当时的佛教金像,即便如正史之一的《魏书》,其《释老志》中也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始闻佛教一事。汤用彤认为,“系魏收依通西域事而臆测之辞,并非述骞所言也”,“而其所流传之故事虚妄不实”^{[10]8-9}。张骞与佛教的传播毫无瓜葛。魏晋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休屠王金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直至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对西行求法之事淡泊,才对张骞西行求法之事少有书写。张骞从西域带回胡乐《摩何兜勒》,则是南北朝时期人们杜撰的历史,尽管目前被移植入崔豹《古今注》中^{[11]17-18}。

张骞通西域,也有与汉武帝求仙之事相关的解读。有人认为汉武帝求生欲望强烈,对生命没有达观的看法,西方昆仑山神仙信仰一直吸引着他,使他对西域昆仑山、天马等充满幻想,乃至不惜发动战争。张骞受汉武帝之托去求仙^[12]。

《史记·大宛列传》有“汉使穷河源”之语,《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也有“自张骞使大夏之后,汉使穷河源”之语。魏晋以来,人们误读“穷河源”之人为张骞,如东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13]840}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认为:“张骞使大宛而穷河源。”清人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指出:“此以穷河源属之骞,乃删节之过。”^{[14]80}

由此误读,张骞又有“乘槎经月”而形成登仙者形象。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与张骞出使西域有了交织。乘槎经月之人由张华《博物志》所说“近世有人”变为“张骞”,由“汉使”“寻源使”转为张骞,张骞已经成为乘槎经月传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从唐朝开始,就有人质疑张骞乘槎经月的真实性,认为此事荒诞不经。而唐宋诗词、敦煌梵文、元明清戏剧等均多涉及,津津乐道,成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唐人赵璘指出,“《汉书》载张骞穷河源,言其奉使之远,实无天河之说。惟张茂先《博物志》,说近世有人居海上……都是凭虚之说……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相袭谬误矣。纵出杂书,亦不足据”^{[15]36-37}。清人冯浩针对《荆楚岁时记》中张骞乘槎的记载指出,“《博物志》止言天河与海通,近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见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而去,芒芒忽忽,不觉昼夜,奄至一处云云,不言张骞。本出傅会,不足辨也”^{[16]280}。

(三)多元的、流变的、糅合再造的形象

隋唐时期人们充分肯定张骞拓边之功。南朝江总《陇头水》赞叹“苦辛提汉节”^{[17]314}，“诗圣”杜甫在《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中赞誉“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18]2428}。唐代诗人笔下的张骞形象,是“苦辛提汉节”的汉朝形象大使,是“许国不谋身”的大汉社稷功臣,是“寻源博望侯”的西域开拓者,是“只得灵槎送上天”的仙家神人,成为展示大唐文明与自信的典型形象。

宋代则发生明显变化,对张骞“使臣”形象多有批评。猛批其功名、耗财的一面,虽然也有赞扬节气的一面,但总体上精神隔膜较深,张骞形象遭遇了某种程度的价值否定。在宋代诗人笔下,张骞不仅是“博望昔所徙,葡萄安石榴”的探险家,而且还是“博望乘槎至”的仙人,更变成了“靡坏财力由斯人”的罪人,也是“争残四夷国”的恶人。宋人诗文中的张骞形象被割裂,其中百折不挠的开拓包容精神被否定,使宋代时的张骞形象失去了灵魂和魅力^[19]。

元代跨过宋代的否定,张骞形象糅合再造。元代文人对于前代“张骞乘仙槎”等游仙意象进行了考证、梳理,并在绘画作品中进行了加工、再造,将“仙人”“功臣”形象糅合一处。“博望侯”张骞成为元人心目中功成名就、德被高远的代表人物,其“出使绝域”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登仙与功名形象之糅合,体现出元代的理性判断^[20]。

明代对张骞传说故事给予较多关注,并增事繁饰,情节更加生动。邓绍基在《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一文中,立足于明清戏曲小说的主题

学,对张骞文学形象有充分的揭示^[21]。明人李贽评论张骞:“身所经历者,大夏、大宛、乌孙、康居诸国,不下万余里,所至戎狄皆爱而信之,以故两度得脱,无困迫忧,则其才力固有大过人者。”^{[22]629} 张骞有一种逢危难转吉祥、变排斥为包容、将仇人变朋友的能力,应当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孙琪从《熙朝崇正集》诗歌中借用张骞乘槎刻画传教士的形象入手,讨论晚明文人利用传统文化对他者进行认知、重写,认为“这种重写反映了异质文化冲撞背景下士人的文化心理”^[23]。

清代之时张骞仍出没于文人笔下和艺术品之中,甚至衍生出除妖救灾的情节。邹近《张骞传说研究》多有论述^{[24]53、56}。韩占红认为:“文学叙事弥补了历史叙事的缺陷,使张骞成为一人‘圆形’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富。”^[25]随着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撰写的《中国》一书、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的出版,将东、西往来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 Seidenstrassen,英文作 the Silk Road),张骞重新成为人们关注和赞美的对象,并引发人们对丝绸之路及其作用的研究。

到了中国近现代,学者充分肯定张骞的历史功绩。1902年,梁启超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高度评价张骞是“世界史开幕第一伟人也”^{[26]1}。翦伯赞十分认同梁启超的评价,在《秦汉史》中盛赞张骞:“他是一个冒险家,又是一个天才的外交家,同时又是一员战将,真可谓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也。”^{[27]156}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在史学视角下,多着重于张骞及其出使西域的史事书写、历史功绩、影响接受与坟墓考古以及与西域历史相关的研究;在宗教学视域下,则以西行求法研究为主;文学界则更多关注张骞各种传说,并与其他故事联系而形成更大的叙事结构。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推动友好交流,对消除边患起到积极作用,适应了国家战略的需要,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当前张骞已成为中国邮票上的华夏名人,进入中学教科书的历史名人,张骞墓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张骞纪念馆楹联:“一使胜千军,两出惠万年。”是最精炼的概括,也是新时代对张骞的最精当的评价。

三、对张骞形象建构的几点认识

对张骞的评价及研究应当注意到早期文本对张骞形象的书写及态度,并系统梳理历代对张骞形象的接受及其体现出的历史认知,更要重视对张骞的历史定位与功过是非评价。这里提供几点未必成熟的认识。

一是早期史籍《史记》《汉书》等对张骞功业的历史书写是基于事实,在价值评判与道德评价上以肯定与赞扬为主,体现史学“实录”精神。所载丝路沿线状况,反映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文明互鉴作用。当然,利用考古发现、域外文献,追寻张骞的足迹,张骞与他的世界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间。近二十年涌现了一大批讨论张骞形象在诗歌、小说、戏剧中流变的文章,人们对张骞的评价也有了更多的文献依据,也让张骞形象更为丰富、多元。

二是张骞形象呈现动态的接受过程与不同的镜像,体现着各时代文化思潮的流变,各区域风俗人情的面貌,不同作者的情感心态,以及特定的民族思维模式与表达方式等。张骞形象提供诸多有意义的话题,激起历代持久不衰的关注,而挖掘历史人物形象流变的转折点和特征,可以观照历史人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逻辑。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克斯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8]2}各种文本在变化中深深烙下时代的印记,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

三是张骞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过程艰辛,张骞展示出报效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爱国精神,勇于开拓、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不辱使命的民族气节,信义待人的精神品质等,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具有极高的传承价值。我们有责任不断总结提炼张骞精神,彰扬其时代价值。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认为:“没有张骞出使西域,也就不会有丝绸之路的开辟。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就不会有汉朝和西域以及和欧洲文化的交流,所以通西域的意义十分重大。”^{[29]235}张骞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过程、意义和时代价值等,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丝路精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与传承弘扬。

四是无论是历史书写、文学叙事、宗教传播、文化归因,还是融合再生,不同元素对张骞形象的历史演化产生着影响。只有通过对不同载体中存在的“选择、建构、想象、创造”诸因素进行分析,探究各种载体是如何被书写、被建构的,以此正确认识历代对张骞功业认知和形象接受的复杂过程,才能懂得当代评价张骞,应关注其最核心的内容,那就是“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沟通中外文明。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张骞作为一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人类文明“对话之路”的开拓者之一,必然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故事。

注 释:

①《齐民要术》卷三《种蒜第十九》引王逸语:“张骞周流绝域,

始得大蒜、葡萄、苜蓿。”《太平御览》卷七七九《奉使部三》引王逸子语:“或问:‘张骞,可谓名使者欤?’曰:‘周流绝域,东西数千里。其中胡貊皆知其习俗;始得大蒜、葡萄、苜蓿等。”

②参见《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博物志》。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 吴见思.史记论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3] 王鏊.震泽长语[M]//王永熙,辑.震泽先生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
-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
- [5] 扬熊.法言义疏[M].汪荣宝,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7] 宋嗣廉.论司马迁笔下的张骞:汉武时期正确外交路线的开拓者[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4):48-51.
- [8] 陆机.陆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 李荣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骞形象考述[J].中华文化论坛,2014(2):100-103.
- [1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1] 阴法鲁.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杂记三则[J].音乐研究,1988(1):17-19.
- [12] 赵雷.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J].船山学刊,2008(1):164-166.
- [13]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4] 酈道元.水经注补疏[M].杨守敬,熊会贞,疏,杨旻宏,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5] 赵璘.因话录[C]//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 [16] 陶喻之.张骞乘槎故事源流考[J].民间文学论坛,1989(2):4-11.
- [17] 郭茂倩.乐府诗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8] 彭定求,等.全唐诗[C].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9] 梁中效.唐宋诗词中张骞形象的变迁[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6.
- [20] 于洁.宋元人心目中张骞形象及其历史渊源[J].中原文化研究,2014(1):64-69.
- [21] 邓绍基.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J].阴山学刊,1995(1):8-13.
- [22] 李贽.藏书·名臣传[M]//续修四库全书,第3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3] 孙琪.张骞典故的变迁与晚明文人眼中的传教士形象:以《熙朝崇正集》中艾儒略形象为例[J].理论界,2010(3):171-173.
- [24] 邹近.张骞传说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6.
- [25] 韩占红.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张骞形象[J].渭

- 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7): 29-34.
- [26] 梁启超. 张博望班定远合传[N]. 新民丛报, 1902-05-22(8).
- [27] 翦伯赞. 秦汉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28] 勃兰克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29] 王若冰. 山河回望[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Image Reception of

ZHANG Qian's Achievements

WANG Huabao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In the Han Dynasty, ZHANG Qian's historical narrative is found in early official historical text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describing him as the "Bo Wang Marquis" who "upheld the principles of the Han dynasty without wavering", and in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portraying him as the envoy who "upheld the principles, completed achievements in the vast land of the Western Region". ZHANG Qian's image is not only shaped by the historical accounts but also by various literary works over the ages. The shaping involves associative thinking, blending with historical writing, literary legends, religious dissemination, and cultural attributions. This has resulted in a multifaceted reconstructed image that includes elements of plant introducer, immortal figures, and many other amalgamated representations. People infused their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into the image of ZHANG Qian, writing their own versions of history in different forms, creating diverse new texts and images with significant cognitive value. The core understanding and image reception of ZHANG Qian's achievements revolve around his "pioneering" effort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lk Road. As an exemplary figure embody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pioneer in cultural exchange, ZHANG Qian's story is an endless tale of fascinating narratives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ZHANG Qian;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historical narrative; image reception

(责任编辑: 韩大强)

(上接第4页)

- [5] 班固. 汉书·王莽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6] 张文虎. 舒艺室随笔: 卷四[C]//张新科, 等. 史记研究资料萃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1.
- [7] 苏轼. 苏轼全集校注[M]. 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校注.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 [8]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 全校本[M]. 黄汝成, 集释, 吕宗力,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9] 刘勰. 文心雕龙译注: 上册[M]. 陆侃如, 年世金, 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

A Textual Analysis of Biographies of FAN, LI, TENG and

GUAN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LUO Biming, QU Jingy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chool of Chinese Humanities, Singapore 637332)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focused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ly overlooked Biographies of Fan, Li, Teng and Guan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existential transference in Sima Qian's portrayal of Liu Bang. Drawing up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etahistory, which explores the transferenc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existence, the paper seeks to elucidate Sima Qian's portrayal of Liu Bang. Sima Qian adheres to the spirit of factual recording, characterized by the principle of "not embellishing the good, not concealing the evil". In depicting Liu Bang's character, Sima Qian unveils both his ungrateful and ruthless aspects, revealing his betrayal of loyal friends and the execution of those who shared adversities. By juxtaposing these revelations with corresponding passages from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and other relevant texts, the paper reexamines Liu Bang's motivation for killing Fan Kuai.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narrative of Li Ji's betrayal of friendship, conveyed through narrative exposition and enriched by a storytelling technique, also reveals subtle undertones of satire directed towards Liu Bang.

Key words: LIU Bang; Biographies of FAN, LI, TENG and GUAN; meta-historical theory; LI Ji's betrayal of friendship

(责任编辑: 韩大强)